



教育·社会·人

厉以贤教育文集

◎ 厉以贤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教育·社会·人

厉以贤教育文集

厉以贤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社会·人: 厉以贤教育文集/厉以贤著.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
ISBN 978-7-107-22730-1

- I. ①教…
- II. ①厉…
- III. ①教育—文集
- IV. ①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0437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38 插页: 1

字数: 590千字 印数: 0 001~3 000册

定价: 52.4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编: 100081)



厉以贤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部前身）教授，国务院首批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教育原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教育社会学、社区教育、终身教育、学习社会。历任中国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研究会理事长、全国社区教育委员会主席、国际社区教育协会（ICEA）理事、全国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会理事长。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马克思主义教育论著选读”课程，最早开设“教育社会学”课程并招收教育社会学研究生，最早倡导开展社区教育研究和实践。1955～1958年在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攻读研究生。曾在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泰国等国进行讲学、合作研究与学术考察，并经常到我国台湾、香港、澳门进行学术交流与讲学。承担过“六五”、“七五”、“九五”国家重点课题的研究。公开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著作、教材10余部，主要有《现代教育原理》（1988）、《马克思恩格斯教育学说探讨》（1985）、《教育社会学引论》（1989）、《马克思列宁教育论著选讲》（1992）、《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1992）、《社区教育原理》（2003）、《学习社会的理念与建设》（2004）等。

自序

这本书选编了我历年来的成果，主要是在国内发表的论文。本书主书名之所以取名为《教育·社会·人》，是因为这样大致可以反映我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我的学科专业方向是教育原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教育社会学，侧重于理论研究。研究教育理论可以有多方面的视角。我把教育看作是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教育是一种活动和过程，其落脚点是人。因此，我认为教育理论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第二个方面是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从根本上弄清楚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教育理论研究必不可少的。

我曾经写过大大小小的文章近二百篇，少数发表在境外，有些还曾有过好的反响，可是没有特意保留。为了选编这本《教育·社会·人》，我才去检索旧作，可是占有有一定数量的在国内外的讲演和在各种学术会议上的发言，许多都找不到了。我感觉在讲演和会议上的表达，与文章相比，思路比较自由、率直和多彩，同时在面对面或是在争论过程中出现不同见解时更能调动自己的大脑的思维，激发出火花。

本书按内容分类编成四个部分：第一编，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研究，12篇；第二编，教育与社会研究，23篇；第三编，现代教育原理研究，13篇；第四编，教育随笔，20篇。

一、我的教育观

根据当今我国现实，我比较强调：教育和人的发展始终受制于一定社会的条件，尽管教育对社会能够起有一定的影响和阻碍作用。现今我国的教育，虽然在规模发展上有了巨大的进步，可是凸显出来的一些问题是根本性的、致命性的。因为所有凸显的重大问题不仅是教育的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例如：教育投入不足问题，教育不公平问题，教育不均衡问题，学校行政化、学术腐

败问题，教育乱收费、高收费问题，教育责任缺失、利己主义膨胀、拜金意识盛行问题，“应试教育”、精神文明与道德滑坡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有人和领导者的因素，但他们也是受着社会影响的。教育体制、教育制度的改革是重要的，但是体制和制度也都受着现实社会关系的制约，也都是由人去制订和实施的。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里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的确，如今我国诸多的教育问题，都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和写照。

我认为，人的发展、人的教育也同样如此，人只能生活在当今社会生活中。人的思维和意识与社会现实有着密切关系，学生如此，教师也如此，教育局长如此，教育部长也同样如此。个人是从社会意识中取得自己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就总体而言，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教育价值观。有什么样的社会风气、人际关系、行为规范、社会舆论，就可以看出教育会是什么样的，人的发展、人的道德和精神文明是什么样的。所以教育的治理和社会的治理是联系着的。

我之所以强调当前社会对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是基于我国正处于社会剧烈的转型阶段，每个人都感受到一切都在发生着改变。我国国力增长，世界地位提升。一方面是快速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另一方面是在一定程度上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道德失落，价值混乱、价值崩溃。我的观点是：任何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以人为本，还要看以什么样的人为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必须要看是谁最先富起来。不同的利益集团会有不同的评价与判断。地价高涨和房产开发商的利润最大化了，买房者只能蜗居了。教育若从公益性变为利益性了，贫苦老百姓就上不起学了。当有些地方政府规避教育责任时，近年来就出现以下情况：如义务教育不义务；某些地方政府减少或挪用教育经费；教育乱收费、高收费、一些公立学校成为营利机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4%仅为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数）的比例，从1993年中央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起，17年了至今没有实现，等等。

我的教育观是：确立大教育观念，通过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提高人的素

质，实现和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态度和行为；教育要有科学理论和思想作为支柱，在我国就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思想。

以上是我对教育、社会、人三者关系的基本理解，这些观点在本书的有关文章里有所论述。

二、我的青年和留学苏联时期

我选择教育专业、走上从事教育的道路纯粹是偶然。我在解放前读小学和中学时，上课没有什么压力，课后能有时间玩，小学时就开始看些《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籍。1950年我从上海市市西中学毕业。在那个年代，一个年轻、稚嫩、懂事的少年，只因为同桌好友杨昌基的一句笑言，说我适合当校长，填写志愿的时候，我就填报了华北地区的燕京大学教育系。那年高考是分大区考试的，所以除了考上华北地区的文科类，我同时考上了华东地区的工科类、东北地区的石油类，可是最终还是选择了燕京大学教育系。上学以后我才知道，读教育系并不是一定能当校长的。燕京大学不仅有美丽的湖光塔影，更有融洽和睦的师生关系和同学情谊；去教授那里如同有到家的感觉，同学之间犹如兄弟姐妹。我住校的宿舍是随意分配的，三人一室，另两位是中文系的研究生，其中之一是后来成为著名红学家的周汝昌。当时他已经耳背，读书勤奋、有他自己的方式，同室两年给予我不少影响。燕京大学的图书馆和体育馆是我喜欢和熟悉的地方，在那里我开始广泛涉猎一些书籍和留下打篮球的身影。

我是幸运的，在青年时代赶上了一个好时期。在燕京大学教育系就读两年之后，适逢院系调整，燕京大学的教育系转入北京师范大学，其他系科专业则并入北京大学。半年之后，因为国家建设大发展的需要，我于1953年2月提前毕业留校成为教育系一名助教。我被分入教育史教研室，先自学半年，9月起承担外国教育史课程的讨论课。我当时的确有很大的压力，由于是提前毕业自己也没有学过外国教育史，和所辅导的同学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只能减少睡眠，每天埋在书堆里，从宽从深两个方面更多地充实自己。可以这样说，在当学生的时候，对所学的课程，只是知道个大概，属于不求甚解。现在要辅导解答他人的疑问，必须自己先找出问题，再去求出正确的答案，需要学会从问题出发去找书、读书、做读书笔记，从这时候起才开始懂得一些应该怎么去学

习。我体会到有压力才会带来挑战，才会产生持续不断追求的动力。特别有意思的是，系里还安排我担任了自己原先学习时所在班级的班主任，成为自己同班同学的老师。这是十分尴尬和犯愁的事，感谢同学们都没有为难我。

一年后，我参加并通过了留学考试，学习了一年俄语，1955年9月留学苏联，在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读研究生，学习教育学。苏联的学习生活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在苏联，研究生的哲学课安排的是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开列了书单，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哲学笔记》、《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等，上述著作很难懂，只能硬着头皮去啃。通过读这些原著，我感到最大的收获是：开始养成科学辩证逻辑思维方式，开始体会到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就不会学习和思考问题，更谈不上去做出真正的学问。教育专业书的阅读参考书也有各教育家的原著，导师鼓励去阅读第一手的材料，不去咀嚼他人的介绍。我的导师加涅林（Ш. И. Ганелин）教授是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在教育史、教育学、教学论等领域都颇有造诣。他要求我到苏联的中小学听课，介绍我去请教其他专家，去开阔视野。他还在我做论文过程中指导我掌握规范的研究方法和程序。我在苏联攻读研究生的生活是多样的。苏联同学不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去死读书，去做个所谓的“干面包”。受这种氛围感染，我也学会挤出时间去吸收和享受丰富多彩的欧洲文化，如交响乐、芭蕾舞、歌剧、绘画、摄影等。列宁格勒，即圣彼得堡，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具有浓厚巴洛克风格的俄罗斯城市，冬宫、夏宫、普希金城、各种风格的大教堂、涅瓦河……这一切也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陶冶，对于形成自己的气质和素养都有着很大的影响。我深深感到生活环境和氛围对一个人巨大的、无形的影响作用。这段经历是特殊的，对我以后的工作、研究以及生活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958年8月我从苏联回国，回到北师大教育系，安排在教育学教研室，讲授教育学。当时学术也搞群众运动，学生成为编写教科书的主力军。从苏联刚回国的我，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过了不久，中苏政治关系恶化，我国政治领域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教育领域批判苏联的凯洛夫教育学。接着是“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正当我年富力强、创造力最旺盛的黄金时期，却遭遇学术荒芜，所学的东西需要批判，真是无所适从。如果说

前一时期是幸运的，那么这一阶段则是悲凉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的写照。

1977年底大学恢复招生后，我也可以上讲台教书了。我喜欢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喜欢尝试别人没有做过的研究，这是自己的性格使然。

三、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我首先开辟的领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论著选读”课程，想把在苏联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重要原著的收益和乐趣与学生分享。马克思是哲学家、政治家，不是教育家，但是他在阐述哲学、经济学的理论及社会问题的同时，对许多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教育原理做出了科学的论述，具有理论意义，是人类教育领域的宝贵遗产。我的体会是：马克思的教育原理其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有二：一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从分工、阶级划分、私有制分析考察了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在历史上第一次科学阐明了教育的社会制约性和教育的社会作用；二是在历史上第一次科学论述了教育与人的本质诸属性的关系，从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的片面发展过程和根源，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盛行的是摘录一些名言、名句编辑集成语录，不说明其前言后语，不介绍其背景和场合，很容易会断章取义。虽也有一些《文选》，但篇目混杂，难以学习。于是我主持编写了《马克思列宁教育论著选讲》一书作为教材，这本书既有原文又有注释和讲解，结合教学能帮助学生明白：读书不能只读那些语录和第二手的书籍，必须首先读原著；只有阅读原著，才可能了解当时写作的背景是什么、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要论述这样的观点等；在一定的背景和语境中理解作者的原意，才不会被曲解，引经据典才不会断章取义。由于我把培养科学的辩证逻辑思维方法用到了教学上，学生普遍反映这门课程是他们最欢迎、最有收获的。《马克思列宁教育论著选讲》曾被定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我认为：马克思的教育思想是一种学说、原理，是引导我们去树立一种教育观，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很需要了解和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方面的许多观点和论述，至今依然是科学原理。例如，关于教育的社会制约性和教育的社会作用，关于教育与生产力的联系和教育在人的劳动能力发展中的作用，关于教育与人的本质诸属性的关系，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教育，关于道德和道

德教育，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请参看本书第一编中的相关文章）。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教育理论、观点、思想方面是不同的。即便同是发达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国家，如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也是如此。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教育观、教育思想、学说和原理，难道不是我们时刻应该考虑和把握的吗？我认为，教育思想、教育观的问题说到底还是社会指导思想、社会价值观的问题。一切教育思想上的问题、教育制度的弊端，社会信仰、诚信、道德素养的缺失，看来都需要从正确的社会指导思想和价值观入手去加以治理。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即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部分，选入了12篇文章。其中有的是论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教育思想，有的是剖析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教育。《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可以为初次涉猎原著的读者作导引。

四、涉猎教育社会学并延伸至社区教育

1982年起我增添了关于教育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当时探索这一新领域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教育社会学是社会学与教育学的边缘学科。由于在1958年“反右”后期许多著名社会学家首当其冲被错划成右派，人们记忆犹新，害怕重蹈覆辙。同时，新中国的教育社会学已中断了三十年，研究十分薄弱，处在恢复和起步阶段，教学上无可借鉴。而教育社会学的接触面又比较宽，涉及教育与社会的各种基本关系、基本问题，难度较大。由于我在性格上喜好挑战新的领域，也比较偏爱研究教育与社会的各种关系及其规律，去拓宽已有的教育学的视野，去发现和解决社会和教育中不断产生的新问题，这样就吸引着我喜欢上了教育社会学。之后，在费孝通、雷洁琼、陈友松等老前辈的引领下，我积极参与筹备恢复教育社会学，1982年将教育社会学课程引入师范学院的课程设置里。我还编著了《教育社会学引论》一书。该书一方面着重论述了西方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及其理论学派，以作为吸收、借鉴和研究西方的“引论”；另一方面着重阐述了中国教育社会学思想发展史略，以作为对中国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填补空白的“引论”。

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分为宏观（如国家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和微观（如学校、班级与社会）两个层面。我比较喜爱和侧重宏观层面的研究，因为

我身处教育领域，这就需要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才能深入研究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我认为做研究理论需要和实践紧密结合，大学老师长期沉溺于书本中，需要从象牙塔里走出来接触社会、联系实际。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社区教育一词对于国人来说还相当陌生的时候，以教育与社会结合为方向探索社区教育是我的学术生涯的又一次尝试。社区教育也是我把理论研究融入实践、指导实践并从实践中发展理论的一个切入口。所以选择社区教育作为切入口，因为社区是社会的细胞，通过在实践中研究社区教育，可以考察和实验教育与社会各种关系，把悬在半空中的理论落在坚实的大地上。

我认为学者的价值在于他的学术研究对实际工作起到的推动作用。我自己定下的方向是：从实际出发构建社区教育基础理论框架，以理论引领社区教育发展，在实验中用理论引导和推进实践，在实践中提升理论。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在社区教育的推进中，做了以下一些事情：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实验点，每个实验点都有显著进步，大部成为全国先进；成立了第一个由学者主持的社区教育学术团体并举办全国性的会议，推进全国社区教育的发展；最先把我国社区教育与国际建立了联系，分享国际经验；最先沟通了两岸社区教育活动，并且自1999年起与我国台湾省社区教育学会分别在两岸举办了十多次学术研讨会；承担了首次由学者主持的社区教育国家课题，通过实验实现示范与推广；首次在我国香港推动社区教育并在香港举办社区教育学术研讨会；首次由大陆学者在澳门进行了系统的社区教育讲座；带领我国社区教育工作者考察团考察美国社区学院，这类考察团官方曾组织过，但由我以学者身份组织的是首次，等等。随着对社区教育研究的深入，我逐渐扩大到研究社区学院、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以及知识社会和学习社会。其间，我撰著出版了《社区教育原理》和《学习社会的理念与建设》等书籍。

五、研究教育与社会

本书的第二编是对教育与社会的研究，我把这看作是与教育社会学研究密切相关的部分，选入了23篇文章。从我的研究思路来说主要是：一切教育现象的出现和发展其根源在于社会，许多社会现象和价值观也必然反映在教育上、在人的思想和行为上。按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 有关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和教育（包括人的发展）的研究，其中包含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教育、经济发展和教育、市场经济与教育等；2. 有关社区教育（包括提高全民素质）的研究，并逐渐延伸到研究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学习社会、学习型城区和学习型社区等。从科学发展观来看，我认为，我国教育的主要弊端是：教育与社会没有紧密结合；教育部门只重视正规教育、学校教育，忽视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学校素质教育流于形式；提高全民素质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体系尚未建立；不论是教育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以及教育内部各部门之间都缺乏整合、协调和互动。这些看法在我这部分的有关文章中都有所论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以增长GDP为目标，随着经济的转向教育也相应地发生了变革。我认为理论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能够提前发现和加以警示，从发展的规律来看，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最需要避免的是以偏概全、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的研究发现以GDP为目标的经济增长道路，世界上一些国家已经经历过，它们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去吸取和借鉴。

在收入本书第二编的《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1988）、《教育与经济发展》（1988）等文章里，我着重阐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已经以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战略取代了以GDP为目标的经济增长理论。因为单纯以增长GDP为目标，虽然会相应地使国家的经济实力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亦会随之而提高，但并不意味着社会进步了。它并不能消除国民收入的差距和不平等，相反，收入分配会趋向恶化和更加不公平，差距反而会逐渐更加扩大。它不能反映落后地区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相反可能使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它还会带来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社会风气堕落等社会问题。它反映在教育上则以为只要高速扩展教育，就必然会实现GDP高速增长。可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国家，不适度地发展教育后，不仅没有出现预期目的，反而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例如，学用无法一致，高学历低岗位，人才外流等等，在发展中国家里印度就是个例子。我在20年前的这些预警，不幸的是在我国这些失误又一度重演，甚至更烈。我的观点是：我国在教育上，不以基础教育为重，在社会经济结构及制度没有得到相应变更情况下，短期内无限扩招高等教育，会出现与其他各类教育不成比例、不相协调的局面，可能会引发出许多社会问题。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我提出了以下观点：除增

长 GDP 的目标外，还要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社会发展是一个整体的观念，着眼点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本身不是目的，人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目的，社会发展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我在文章里还提到：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多，只是为人们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提供了可能。然而，作为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生活是否真正地得到提高和提高了多少，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是否公允、合理以及达到什么程度，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是否良好以及形成什么状态，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确立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和教育制度。我以上这些 20 年前论点，今天仍然坚持。

我国已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本书有关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文章里，我论述了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对教育既有促进作用，又有消极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教育·精神文明建设》（1995）一文里，还强调了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会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和社会价值导向。我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价值观和社会价值导向应是坚持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反对通过损害社会或他人而从中得到利益。为已利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为应当遵循的道德原则，而一旦超出市场经济领域，社会仍然应该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本书第二编选入的有关社区教育和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学习社会方面的研究文章，我认为是贴近时代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是在强调推动树立大教育、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和提高全民素质的观念。

《社区教育的理念》（1999）和《社区教育的推行》（1999）两篇文章，对社区教育做了全面论述：对社区教育下了自己的定义，强调了社区教育是为了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的素质和生活质量，发展社区。文章大致构架了我的社区教育理论框架；阐释了社区教育与社区发展、社区教育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原理；说明了学校与社区的双向关系等。我很高兴的是文章中所提出的理论观念，大多已转化为实践，引领了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但我认为真正把科学理论付诸实践还需要时日，需要制度层面的改革、指挥者的理论素养和品德的提高以及执行者的独立思考等。

在《学习社会的理念和建设》(2005)一文里,我对学习社会的概念、基本属性、特征以及学习社会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学习型城市建设》(2004)、《学习社会·终身学习·社区学院》(2006)中,我论述了建设学习社会过程与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以及社会教育、社区学院的发展问题。我在实践中发现许多人不清楚什么是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于是在许多场合对此做了阐述。我强调终身教育着眼于教育客体,侧重于创造学习条件,建立各种教育机构,提供教育场所和机会,建立和架构使学习者终身受到教育的体系,使学习需求得以实现。终身学习着重从学习者以主体角度,强调个人在一生中能持续地学习,以实现个人在一生中各种学习需求的满足,是学习权和发展权的实现。我认为建立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体系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社区教育是实现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必不可缺的。社区学院是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体系中的一个实体。完善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体系是迈向学习社会的基础。

《终身学习视野中的社区教育》(2007)一文是应邀写的,杂志编辑希望我从终身学习和社区教育的趋势和现状进行学者视角的解读。于是在文章里我除了理论阐述外还直率地提出了我国一些官方教育文件中在终身教育体系上的认识误区,说明了我的见解,并对社区教育上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提出了质疑。

《社区学习的理念与在大陆的推动》(2008)是我在我国台湾的一个研讨会上的专题发言。由社区教育转向社区学习是国际趋向,是由终身教育转向终身学习所引发的。在该文里我对社区学习在理论上做了全面释义。

六、研究现代教育原理

本书的第三编是现代教育原理研究,选了13篇关于研究教育原理的文章。因为我对理论感兴趣,研究教育原理是我从事教育工作以来一直坚持着的。改革开放后打开了国门,有机会出国、出境讲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做访问学者,接触到了许多新鲜的东西,开阔了视野。我重点研究和探索符合当前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现代教育思想,新的教育观。1988年我主持撰著出版了《现代教育原理》一书,它写于1985年,在内部使用过程中曾得到广泛好评。《现代教育原理》这本书的创新在于使用了一种新的规范,以新的逻辑来对教育加以诠释。它吸收了当代教育科学最新成果,特别是吸收了许多边缘学

科的成果，以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水平。它具有时代特点，反映了现代社会对教育发展的要求；引用了国内外的理论思想和资料，阐明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和特点，结合我国实际，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教育的要求。我在书里介绍和引用了大量国内外的事实材料和数据资料，做到了中外结合，观点和材料统一，使全书的内容丰富、充实，增加了理论说服力。这本书被许多院校作为教育专业的教材，再版了多次，影响较大。

第三编文章的内容较广，反映了我个人观点的有：《现代教育的理论探讨》（1987），《高等教育观念、高等教育发展改革和社会文化》（1995）、《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1997）、《关于“教育起源于劳动”问题》（1981）等。我主张现代教育是与传统教育相对应的概念，不应以生产工具（大机器生产）作为现代教育起始的标志。我强调社会文化直接地、深刻地影响着教育观念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教育的观念、价值观甚至教育制度都根植于传统的及现时的社会文化。

教育起源于劳动的论点自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传到我国，一直不容置疑。我在《关于“教育起源于劳动”问题》（1981）一文中，运用现代生物学、哲学、社会学和教育原理的结合，质疑了这一论点，提出了教育活动起源于适应和满足人类社会生活（人类生存方式）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尽管这是颠覆性的新观点，可是在发表时没有引起讨论。过了七八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发起了教育起源问题的讨论，各抒己见，争论还很热烈。当我看到一位作者发表的文章，不注明出处地重复了我的观点和一字不差地摘取了一些关键性的论述话语，只能无语。

在第三编收入的关于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3篇文章中，我对终身教育做了理论论述，说明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是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的共同要求，并提出了在我国实施终身教育的政策措施和改革教育的意见。如果把第三编和第二编的有关文章结合起来，就可以比较全面了解我对关于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观点。《面向21世纪的人才素质、教师素质及师范教育改革》（1997年）一文，原本是我的一个发言。其中提到的人才观、知识观、学习观和伦理道德观以及对教师素质的要求，我感到至今仍有新意和现实意义。

七、教育随笔

本书的第四编教育随笔，选入了20篇短文，是应《中国远程教育（资讯）》杂志之约从2004年初开始写的，该杂志约定每篇字数为1500字。我写了三年，到2006年底主动停写了。这些短文内容较宽，大部分是分析当时的教育与社会现象的，是从实际问题里引出想法的。

《教育蛋糕该如何切分》（2005年4月）一文，我驳斥了在许多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时，有的教育官员、专家却说：大学毕业生回炉再造重新接受职业教育培训，是很正常的事。这样，那些把想从教育蛋糕中切分一块获取最大利润的私营教育培训机构，肯定都会兴高采烈。

在《义务教育的“义务”是非》（2005年5月）里我说明了在义务教育上，一些政府和教育部门曲解和利用了“人民教育人民办”口号，没有完全承担起国家、政府应尽的责任。在《教育乱收费症结何在》（2005年9月）里，我的回答是：在于政府责任的缺位。当提出把教育收费当做政府投入的补充，是不是为教育乱收费提供了政策缺口，成为教育收费“越位”的根源？

在《3.15、两会和教育》（2006年4月）一文里，我指出3.15、两会、教育这没有联系的三件事，在当年之所以会紧密联系和凸显出来，是因为“维权”。在教育领域剥夺老百姓权益的现象较为普遍和严重。

在《农村城市化与教育》（2004年7月）里，我论述了农村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素质、能力、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都要跟着转换和提升。这就需要通过社区教育来实现。

在《奇怪的博导游戏规则》（2004年11月）和《博导资格和博士生质量问题的背后》（2005年7月）里，我通过几个事件说明：有的博导之所以能运用权力“玩弄”博士生招生，是因为凭借“制度”，或说是没有制度所致。博士生学位论文不像样也能通过，也是因为凭借“制度”，或说是没有制度所致。之所以出现此类问题，因为背后有各式群体进行着交易性的“共谋”。现象背后反映的是社会风气不正和价值观念不当，反映的是社会问题、校风问题、学风问题、职业道德问题。

在《激发学生对信息的预期需求》（2005年2月）里，我分析了为什么中国学生会每天花几小时去上网聊天、玩游戏、看电影。因为“选择的或然率＝

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施拉姆）。根据传播学大师施拉姆的这一公式，我提出了几点改变上述问题的教育方略。

《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2005年4月）是一篇理论短文，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现在建设什么什么社会的提法太多了，有些令人糊涂。我分析了各种社会的提法的内涵，认为：作为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层面来说，各种提法都是为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教育随笔因为字数所限，自己感觉没有说透，或是不便深说，这是遗憾。

以上简短地介绍了我的学术的历程、思考和探索。我文章中的有些观点是一孔之见，有些可能会引发讨论的。回顾自己，我始终在努力坚持我的学术信仰，维护学术尊严。一个人的学术生涯是短暂的，但我相信真正的理论是会持久地经受住考验的。

这本书能够出版，我要感谢我的学生孙玲、毕诚、魏曼华、郑新蓉等人，没有他们的促进和推动也许我没有这种积极性。我还要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及该社魏运华、吕达、刘立德、韩华球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我也要感谢曾经关心、爱护、帮助和支持过我的所有人。

厉以贤
2010年2月于北京